

龍勝文史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龍勝各族自治縣委員會編印

## 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胡世民

副主任：廖炎 陈善

委员：陆德高 秦维琪 廖康英 董炳

谭文经 伍兴越 唐文鸣

本辑责任编辑：陈善

封面设计：罗兴华

# 目 录

- 延安情 ..... 苗延秀 ( 1 )  
忆周大治同志 ..... 秦庆标 廖 炎 ( 13 )  
一生劳瘁作园丁 ..... 何猷献 ( 19 )  
赵家晋二三事 ..... 韦佩河 ( 23 )
- 小江起义纪实 ..... 伍兴越 ( 26 )  
伟江人民奋起抗战，龙胜青年不做顺民 ..... 廖 炎 ( 42 )  
解放战争时期，龙胜中学进步师生革命活动片断  
..... 阳昌麟 蒙永庆 ( 49 )  
侦破反革命“民族兄弟团”的回忆 ..... 阳肇干 廖光 谭文经 ( 55 )
- 民国时期我县行政区划之变化及其它 ..... 杨彦能 ( 58 )  
解放前的龙胜县城 ..... 董 弼 ( 61 )  
关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和高级小学校的回忆 ..... 谭云开等 ( 83 )  
解放前龙胜卫生事业简况 ..... 秦贞勋 ( 77 )  
抗战时期，龙胜合作社组织发展情况 ..... 廖 光 ( 75 )  
成人教育忆旧 ..... 梁 玉 ( 80 )  
龙胜林业旧况点滴 ..... 梁 玉 ( 82 )  
解放前瓢里街的一些情况 ..... 唐钖爵等 ( 69 )  
解放前瓢里商业市场简况 ..... 简 嵘 ( 74 )  
龙胜纸币流通史话 ..... 陆德高 ( 90 )

ZAB6/34

- 吾师祖明镜大师之历略 ..... 释达本(95)  
归仁洞敬道草堂记 ..... 石崇超遗作(101)  
  
抢老师 ..... 雷雨(103)  
食盐旧话 ..... 周亚森(105)  
国民党79军勒索民财一例 ..... 吴光球(107)  
黄龙寨之战 ..... 梁堂清(109)  
  
亘古碑记 ..... 石修龙抄录(111)  
订正 ..... (102)

## 延 安 情

苗延秀

我的故乡人勤、山水秀，我很想念它。但“平等”不平，没有我立足之地，更无出头之日。我这个“不肖子孙”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人人平等，个个亲热，犹如投到亲人的怀抱。

在亲人面前，我如实地写了自传，把我人生旅途上的曲折道路，毫无隐瞒地作了交代；把我自己复写的，偷盖有“军事委员会中缅运输局仓库事务所”公章的“出差榆林”<sup>①</sup>的路条，交给组织。不久——一九四二年四月底，我考入延安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

我记得，当时考我的是延大教育科长智建中。他中等身材，戴副眼镜，有一颗稍外露的小暴牙，但人显得很清秀、热情。他在半山坡的窑洞里，考我翻译一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古文为白话文；而主要的一门考题却是政治和哲学。那时，同考的还有从山西民大来的两位同志，我考取了。入学后，在山腰用木桩放上长横木作凳的简朴的大礼堂里，吴玉章校长亲自上语言学，名教授何思敬上政法课，教育家刘泽如上教育学。其后，进行院系调整，我被调到延大行政学院学习。到行政学院不久——大概是1943年三、四月，一天上午，

---

注①榆林在延安北边，当年是国民党邵宝珊的统治区。

周恩来同志到学生宿舍（在山上的窑洞）来看望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学习小组长王凯道：

“你是哪里人？”

“河南。”王凯回答。

“河南多士。”周恩来同志赞扬道。他说得郑重、亲切。

“‘士为知己者死’。忠于皇帝，奴才气；或做食客，吃人家的残羹剩饭，没出息。”身材矮小、有两颗金牙的王凯，自觉高明地说。

我觉得王凯不识抬举，有点鄙视他，但不做声。

周恩来同志不但不板脸堵塞言路，反而高高兴兴地笑笑说：

“古代读书的人叫‘士’，屈原是其代表之一，李白、杜甫也是。‘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诗句，表现了李白的思想感情，可算是难能可贵吧！？现代读书、有学问的人，叫‘知识分子’，鲁迅是其代表。毛主席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你们是大学生，大知识分子，任重道远啊！”

我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非常兴奋，两眼熠熠地盯着他，一刻也不离开。我边看边想：“周恩来个子高，浓眉大眼，四方脸棱角分明，有点稀稀的络腮胡，气宇轩昂。他威而不猛，平易近人，语言豁达，虚怀若谷，气量大，‘宰相肚里可通船’，具有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敬佩，敬佩……”

我正沉思默默，周恩来同志突然问我道：

“你是哪里人？文质彬彬，那么清秀，大概是来自山青水秀、鱼米之乡的南方吧？叫什么名字？”

我从瞑想之中清醒过来，笑着直说：

“不错。我是广西‘蛮子’，侗族。小时，我在家乡爱打架，父亲怕我命短，给我取名伍延寿；现在我改名为伍延秀，立志做永不褪色的革命战士。”

周恩来哈哈大笑，赞美我直爽，名字改得好。整个窑洞，充满着欢乐。

我精神奋发，又说：

“红军长征经过我们侗乡时，周恩来同志和红军指挥部驻在龙坪寨鼓楼①下边的木楼里。国民党的特务放火烧寨子，周副主席和邓发同志登上鼓楼，指挥红军救火，擒拿两个特务，把他们枪毙了。大火过后，听说周副主席责成红军供给部，在鼓楼坪上给受难户发救济款——全是银元。发钱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领导同志。钱一个个的问，一个个的发，四个纸袋的光洋全都发完。我们侗家人很想念红军和周副主席哩！”

周恩来两条浓眉一扬，目光炯炯地如两盏照灯照着我。他又一次和我握手，说：

“你来自遥远的苗岭侗乡，难得，难得！希望有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年到延安来学习。”停一停，他回忆遥远的、多灾多难的艰苦年代，又说道：“侗族人民受苦受难；还给红军热情支援，送粮、带路，非常感谢。现在，那个鼓楼还在吗？”

“在。我离开家乡时，它还完整地屹立在全寨最高的顶尖地上②。它象保护神，与寨子和侗族人民共存亡。”

---

注①鼓楼是侗族建筑的明珠，它高十至十五米，有五层至十一层飞檐，可容纳二百人集会。有寨必有鼓楼，是传统。

②这个鼓楼，现命名为“红军楼”，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鼓楼有几根合抱的大柱子，掀起层层飞檐。硕大的鼓楼，全是杉木凿榫稳合，不用一颗钉子，几百年不垮，建筑工艺高超，了不起呀！你们侗族不蛮，勤劳、勇敢，有智慧。应该给你们的民族脱掉‘蛮子’的帽子。我们党的理想之一，就是实现民族平等。”

周恩来同志赞美我们侗族，我非常高兴。而一些原来不知道我的情况的同学，却非常惊讶。

在延安，学什么专业，是比较尊重个人意见的。我在来行政学院之前，曾与徐特立的秘书沈哲民同志（四川人），一度按照自己意愿，在延安大学俄文系学习几个月，当年，朱子奇、张东川等同志就是我同班同学；其后，把我调到行政学院学习，没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要求转去鲁艺学文学。1943年7月，行政学院秘书余修①同志给我写介绍信，我转学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部文学系学习。

当时，严文井同志任文学部主任。他考我三门课：一、半天写出一短篇小说，题材、题目自选；半天写出一篇文学论文，题材、题目也自选；三、口试。

好严格啊，鲁艺！

半天写出小说和论文来，谈何容易！但是，三门课我都考试合格了。现在想起来，我写的那篇小说，虽然很幼稚，但主题是好的。我写了跟我在延大同班同学的姓崔的朝鲜同志，他没有祖国，在延安学习和生产都很积极，歌颂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至今，他的面貌我还念念不忘）。而那篇论文

---

注①余修同志是三十年代“左联”作家；解放后，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校长，现已去世。

是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写的，结论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就得长期深入生活，甘当人民群众的“老黄牛”。

我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侗族人民的儿子，能进延安最高的两个学府读书，真是有如喜从天上来，豪情壮志满胸怀：

“我要为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而歌唱！为勤劳、勇敢而又受苦受难的侗家人民而歌唱！我要歌唱共产党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黄巢的《他日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之梦没有实现，共产党却把它变成现实，侗家儿女与各族儿女欢聚在延安学习、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翻身而共同奋斗，怎不令人兴奋！于是，我无论是整风和学习文学创作，都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念不完的书，如饥似渴地埋头读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我特别喜欢普希金描绘农奴起义的《上尉的女儿》和卡达那夫歌颂劳动与爱情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在院部窑洞前的大院里，我认真、专心地听了刚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同志的形势报告和院长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多次讲课，在鲁艺的广场里，看了《白毛女》的第一次演出；在大礼堂里（天主教堂）听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诗朗诵和于光远的国际形势报告。我在老作家、诗人何其芳、荒煤、严文井、舒群、邵子南、公木等的指导下，用开荒得的带有紫色花纹和喷香的丁香木做的蘸水钢笔，写出了真正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红色的布包》（载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现收入《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在侗族文学史上迈进了小说的新领域。其后，我又在膝盖上和煤油灯下，陆续写出长达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共产党又要来了》（载一九四九年周立波、

马加主编的东北《文学战线》，现收入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短篇集《南下归来》）。

这两篇作品，是以下述生活为依据——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经过我家乡龙胜县北部侗区和通道、黎平等县城，当年国民党除派正规军堵击、围攻红军外，还派民团充当打手。龙胜侗乡宝赠的民团团总鲍钩，曾带民团到平等（我家所在地）堵截红军。他们在平等寨外的田塅里，被红军用包围的形势向其反击（因民团多是侗族贫苦中青年农民，红军只朝天打枪把他们吓跑，不伤害他们）。鲍钩之流，弃马逃过平等河，连裤子都掉下来而屁滚尿流地爬上六田，逃回宝赠。龙胜县民团司令黄人超，派住在县城城墙外、靠城墙而居的一个老寡妇唐伯妈的儿子唐刚宁带民团到平等打红军，被红军击毙在我家屋背后的山上。其后，这个痛苦的唐伯妈（她的房子歪歪斜斜要倒，无钱起新房，用树干撑着；她只有一子一女，开小客棧、种菜、打柴过活，会讲侗话），哭天哭地逃到平等山上把儿子尸休弄回县城，县民团司令黄人超亲自主持追悼会，吹唐刚宁是“英雄”，而唐伯妈却天天哭，昏天黑地，把眼睛哭的几乎瞎了。她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招平等的一个侗族青年作上门郎。平等侗家有事到龙胜或去桂林，都在她家留宿，把唐伯妈当作自己家人。我曾多次在她家住，对唐伯妈不幸的命运，深感同情。我离开故乡时，还丢掉行李在她家（后来据说唐伯妈叫我父亲来挑回平等）。

当年红军过我家乡，群众被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欺骗，绝大多数都躲到山林里去了。红军吃的吃菜，主人不在家，就把光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用红布包着留给主户；着别是镇压了恶霸地主石安玉，开仓济贫，使侗族人民觉醒，认

识红军是好人，常常想念红军和共产党。

我根据上述的所见所闻，写《红色的布包》和《共产党又要来了》时躲在文学系小土平房教室的角落里，边写边哭，泪流满面，与作品中主人公唐伯妈同呼吸共命运。这两篇作品，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当然，故事的情节也有虚构，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是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志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里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照鲁迅先生经验写的这两个姊妹篇，意图塑造侗族老妇人唐伯妈①勤劳、善良，容易受骗继而觉醒的形象。通过她，展现侗族人民反抗压迫的精神和思念红军的思想感情；揭示革命的洪流必将席卷祖国大地，赢得各族人民的解放。

鲁艺学生，以鲁迅为师，学习他的文艺思想来指导创作，但决不是模仿，而是把它融合在根据实际生活而进行的创作实践中。它的效果如何？当年，我的创作辅导老师邵子南同志对我说：“艾青同志问我：‘你们鲁艺文学现在的学生水平怎样？’我说：‘《解放日报》载的短篇小说《红色的布包》，作者就是文学系的学生，你看怎样？’他说：‘可以。’”这对我是鼓励，也是鞭策。我对邵子南同志那种热情、朴实、直爽的性格，以及具有四川人善于“摆龙门阵”的特点，十分欣佩；而他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反映抗日战争的民兵炸死许多

---

注①后收入短篇集《南下归来》时，改为王伯妈。

日军的短篇小说，我更非常欣赏。他多次教育我，直到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开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时，他还对我说：“你是侗族，要开侗族文艺之花。”我更一生难忘。

邵子南同志是我良师益友之一，可惜他死得太早（1955·12·24），死时我没有去重庆给他送葬（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噩耗），感到很遗憾！

在延安，我生活得很愉快，可谓纯真无邪。王大化、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和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延安的秧歌队春节演出的节目，使我大开了民间文艺之花的眼界，对我日后重视民间文学的再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至今念念不忘。（解放后，我写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和《元宵夜曲》，就是这种影响的体现。①）

《延安颂》的歌声，在延安河边，在延安山城，在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响彻云霄，表现了人民对延安的深厚感情，鼓舞我们奋发向上的革命激情，许多人至死还动心肠。

在延安，物质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困难，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革命者追求的是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纵苦犹甜。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规定：大专院校教授、教师学生，每年每人要交一石公粮，做到整风、学习、生产三不误；棉衣要自己缝，毛衣自己纺成线来打，人人要学会纺纱

---

注①1954年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纱代交公粮)。一声令下，我也学会了纺纱，每天能纺六两到八两的上等棉纱。天一亮，在窑洞门前的院子里，在教室里，在大礼堂中(天主教堂)，一阵阵纺车之声，象成千成万人的大合唱，响入天上。外单位亦莫不如此，方纪同志还为之写了篇小说《纺车的力量》，载当年延安《解放日报》，颇得好评。不是吗！？我们班的同志韩书田，就曾写了一篇相当长的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上赞美她。韩因此得到何其芳同志的赏识，把他调到研究室当秘书，与他合作编《陕北民歌选》。

在鲁艺文学系，学生还自己种粮食、开荒、打井、种菜、纳鞋底、扎牙刷、打草鞋、背煤块、去深山里烧木炭……等等，什么都有人干，真是干劲冲天，谁也不说苦，更不甘心落后。例如：后来成为名诗人的戈壁舟，成为作家和理论家的恩基，成为部队专业作家的李南力等同志，就曾自愿较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种粮食；我和纪云龙(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张兆虎(后来成为农业电影制片厂厂长)等同学，于1944年8月去杜甫川一带的深山里烧木炭，一去就是几个月。烧窑、出窑、砍荆条包装、赶毛驴驮运等等，一个个弄成像个黑人似的，连吐痰、拉尿都带黑色；特别是出窑(搬炭)由于窑里和木炭还有火温，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抱炭磨得肚皮都起了黑茧。黑人黑木炭一色，要是不说话，不听声音，我们谁也认不出谁。辛苦是辛苦，但我们很愉快，在荒山野岭里，跳到溪中打水仗，你泼我，我泼你，把怒开的朵朵白色水花往黑炭般身上栽，放声歌唱：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在水里不会下沉，  
在火里不会燃烧，  
我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烧炭时，我还遇到一件事——

陕北的深山有狼，狼被我们的伐木声和倒树的响声赶跑了。大雪封山时，快到元旦，我们已超额完成任务，共烧出木炭11万多斤，回到瓦窑寨总结工作，准备回学校。我们的组长（是行政学院的）发现，有一对借用的泥箕没有还给老乡，他们过冬要积肥，叫我一个人去窑里取回来还。那天一早，雪铺的遍地银装，有半尺深。我拿一根木棍探路，走到窑里取回泥箕时，感到深山里冷沉沉的静得两耳欲聋，有点胆寒。我唱桂戏《薛平贵回窑》来壮胆，当我唱到薛平贵离窑十八载回来与王宝钏见面时，在林中小径上遇见一隻大灰狼。我没有枪，感到危险。但为了不被狼吃掉，我把泥箕扣在头上，防老狼拍肩咬我的喉咙。狼跟在我背后，寸步不离。我一步一棍往肩后打，它一次也不敢往我肩上爬，却紧逼我不放，发出嗷嗷的嚎叫声。我以为它是饥饿而叫，哪晓得诡计多端的豺狼，用嗷嗷的嚎叫声呼喊来它的同伴——一群狼。“完了，完了！我不死于战场上，却死于狼的口。冤哉，我的上帝！冤哉，我的萨千巴！”①

我暗自喊着，但为了逃命，我越走越快，在雪地里又跑又跳，跌跌撞撞，挥舞棍子和群狼斗，我在群狼包围之中……

正当我万分危险，精疲力竭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声，把群狼吓跑了。我们的组长和几位老乡，来救我来了。有位穿着羊

---

注①“萨千巴”，侗族送祖女神。

皮袄、面庞棱角分明、身体结实、性格粗犷而又浑厚的中年人说道：

“雪封山，狼出窝，牛羊不能留在野山坡。你为啥个人跑来这里？”

我无言以答。组长代我说：

“不怪他，怪我。回去我检讨。”

……

我在延安，不仅吃陕北人民的小米长大，而且连生命都是他们保护的。我爱陕北人，我和陕北人民结下生死不解的友谊，永生永世不忘！

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学习、成长，是我人生旅途的黄金时代，一切都念念不忘。

我历历在目：在庄稼成熟的季节，延安周围的群山，长满了黄金似的小米和麦子。我曾和鲁艺文学系同志，有时下乡帮助群众收割；有时参加本院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秋收。我们这一群男女文学青年，都很积极，热火朝天，歌满山，粮满仓，实现了毛主席号召的“丰衣足食”。说起来也怪，许多刚来到延安的女同志，开始不习惯于吃小米，但一旦吃惯了嘴，就感到越吃越香，长胖了，脸红了，美了，象朵朵鲜花争妍吐艳。要是哪个结婚，其乐更无穷，大家穿着草鞋在院子里与新娘跳舞，扭秧歌，唱陕北民歌《蓝花花》、《哥哥要走西口》等；新婚的宴席上，只有一个菜：金黄的小米饭上放红枣，真是纯朴、美丽、甜蜜极了！此情此景，触动了我的文学心灵，于是，我在延安又写了一篇小说《农家姑娘》，以同班同学梁玉为模特儿，反映从北平经晋察冀边区到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的激情。（载一九四九年周立波。

马加主编的东北《文学战线》，现收入短篇集《南下归来》。

我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正确的。他指引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深夜十点钟左右，我还没有睡，站在文学系院外的山坡上，突然听到一阵阵鞭炮和锣鼓声，伴着呼叫声，从沟那边的戏剧音乐系传来：“日本鬼投降了！日本鬼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中华民族万岁，万万岁！”

我是班长，热泪盈眶，喊醒了当时任系主任的舒群，也喊醒了全系同学，告诉他们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于是，人们互相拥抱，并自发地用烂布烂衣服倒上煤油，做成火把，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股长长的火炬游行队伍，涌向桥儿沟街头，通街来往返复游行，高呼口号，通宵兴奋难眠。第三天——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我们在戏剧系的院子里，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晚会。我们又跳舞，又朗诵自己充满着激情的诗句，高唱八路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

我们又一夜狂欢不眠。

抗日战争胜利了，新的任务到来了。去东北的、去华北的、去华东的、去华中、华南的，还有去陇东的，一批批干部走了，一批批同志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党中央决定鲁艺

# 忆周大治同志

肇庆标 廖 炎

“周大治是个好同志。”我们都这样说。可是在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日子里，有些人偏要说他“问题大得很”，日夜追逼。逼得他走投无路，乃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死明志，酿成悲剧。

---

要迁往东北解放区。我随院长周扬率领的鲁艺师生，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奔向新的解放区，奔上新的工作岗位，迎接新的战斗——摧毁蒋家王朝，解放全国人民！

如今，我离开延安四十一年了，鬓角斑白，记忆力衰退了，而且已离休了，但延安杨家岭党中央的大礼堂，王家坪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的营房，桥儿沟鲁艺的教室，清凉山上的宝塔，清清的延河水，冬暖夏凉的窑洞，以及一个个象馒头式的黄土山和古朴、坚强、勤劳、勇敢的延安人，都仍历历在目，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啊，延安！我想念你，我的子子孙孙都想你，愿你的革命精神，千秋万代永放光芒！

（中篇传记文学《不平坦的道路》一章）

1984年4月17日，初稿

1987年1月11日至3月8日，第九次修改